

论长安文化

黄留珠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把长安文化理解为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陕西文化,比较适中。史前长安文化可追溯到百万年前蓝田猿人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长安文化发展经历了西周、秦国秦朝、西汉、隋唐四次高峰,创造了辉煌。长安文化的特点,一是肇兴较早,二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三是长期居于引领地位,四是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五是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关键词:中华文化;长安文化;发展高峰;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3-0001-08

以汉唐古都的名字“长安”命名的“长安文化”,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

一、长安文化释义选择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何谓长安文化,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现有的主要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认为长安文化即汉唐两代的都城文化。其范围被限定于长安城这一特定的区域之内。如果概括地表述此类观点,或可称为小长安文化。

第二类,认为长安文化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乃至整个陕西文化,是中国众多地域文化之一。这或可概括称之为中长安文化。其大大突破了长安城的范围,代表了一个较大的地区文化。

第三类,认为长安文化是五代以前或曰公元907年以前的中华民族文化。此观点与前述第二类观点相似,都把长安当作一个符号使用,不过在这里其所代表者已远远超出了“关中”、“陕西”的范围,而指整个中华民族。这或可概括称为一种大长安文

化了。

以上三类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问题的结果;对三者没有必要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整合;三者的共存与发展,对于深化长安学研究无疑都有益处。不过按照笔者的理解,第一类观点所限定的空间范围似乎过小,第三类观点的空间范围又显得过大,倒是第二类观点的空间范围相对比较适中,故拟以此为准略陈浅见,以就教于贤达。

另外,从时间上来说,亦准备突破把长安文化仅仅局限于汉唐时期或五代以前的范式,而将之视为一种自史前至当今的地域文化。只是由于笔者学力所限,本文所论仅止于1911年之前。

二、长安文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在蓝田县境内发现的距今百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拉开了史前长安文化的帷幕。由蓝田人与距今18万~23万年的大荔人、距今3.7万~5万年的陕北河套人、距今1万年的沙苑人以

收稿日期:2012-06-18

作者简介:黄留珠(1941-),男,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及以半坡、姜寨、北首岭诸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以客省庄、米家崖等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为我们勾勒出史前长安文化演进的基本线索。按学术界较普遍的认识,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大体便与传说的炎黄时代衔接上了。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在以长安为中心的黄土地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迹。相传记在黄帝名下的发明创造有30多项,如井、火食(熟食)、衣裳、冠冕、釜甑、灶、陶器、舟楫、车、杵臼、旃(毡)、宫室、棺槨、伞、踢球、镜、货币、几案、天文历法、嫁娶制度、分土建国、礼法制度、市场、坟墓、兵法、弓箭、阴阳之事、文字、图画、音乐、指南车、鼓等等,涉及衣食住行、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诸多领域。尽管这些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长安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当进入文明社会后,长安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高峰,而在唐代达到极盛。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在西周时期。周人起家陕西关中,克商后以分封制与宗法制为基础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他们秉持的天祖分离观、天命转移论及以“德”、“孝”为主的伦理思想,把夏商以来思想史的发展推至新阶段。传世的《洪范》、《周易》等文献,具体反映了当时思想、学术的飞跃与发展。西周甲骨文、陶文、金文,充分显现了周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而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为后来的小篆、汉隶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小学、大学两阶段组成的国学教育,虽然面向贵胄子弟,但所建构的相当完整的教育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尚书》、《逸周书》、《诗经》中那些属于西周时期、出自长安地区的作品,具体地反映了当时散文与诗歌的水平。在艺术方面,无论是乐舞还是雕塑,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孔子曾称赞西周雅乐《大武》“尽美也”^[1],而考古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玉器等,其雕琢技艺之高超,其艺术品相之精美,皆令人赞叹不已。就科学技术而论,当时在天文历法,数学与力学、光学、采矿及青铜冶铸、医学、建筑技术、陶瓷制作等领域,都有显著的进步。如周人将一个月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四分法,如《周易》八卦中应用的二进制制,如青铜铸造的“六齐”规定,以及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宗庙)建筑基址所反映的建筑技术等,皆为典型例证。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在秦国、秦朝时期。一般认为,秦人始国自襄公受封为诸侯。

其后经五百多年的奋斗,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建立了秦王朝。秦人吸纳周文化,信仰天帝,并特有五帝崇拜。其先以礼乐法度为政,继而专用法家思想治国,最后依据五德终始论设立水德制度,以维系帝国的运作。秦文字与周同属一系,尤其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此举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秦时除宫邸学、博士学外^①,还为“史子”特设名为“学室”的学校,以培养“史”类专门人才。及秦朝后期,“以史为师,以法为教”,乃至“焚书坑儒”,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悲的一页。在文史方面,《诗经》中的《秦风》与《尚书》中的《秦誓》,不失为反映秦文学水平的代表之作;而被司马迁评曰“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的秦编年体史书《秦记》^[2],今从云梦秦简《编年记》似仍可窥见其简略之风格。在艺术和科技领域,秦所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秦始皇陵园先后发现的兵马俑、铜车马、铜禽、百戏俑等,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秦在雕塑艺术、工艺美术、散乐杂技与制陶、冶金等诸多方面所达到的令人震惊的高超水平。而秦在壁画、乐舞、医学、时令、筑路技术、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成就,或见诸文献记载,或见于出土实物,亦均达到极高的水平。今仍存留在陕西大地上的秦直道遗迹、郑国渠遗存等,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佐证。当然,秦的最大贡献还在政治文化方面,即秦所创建的大一统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帝国范式,以及由皇帝、公卿与郡县组成的科层结构的集权式政治制度。这二者共同构成所谓的“秦制”、“秦政”。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在西汉时期。传统有“汉承秦制”之说,是讲汉把短祚的秦王朝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继承下来,完善、规范并发扬光大,从而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汉初崇尚黄老之学,武帝时独尊儒术,不过其真正实行的却是“霸王道杂之”^[3],而这奠定了以后历代王朝治国指导思想的基调。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对文献整理与文献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亦具有某种学术整合的意义。经今古文之争,表面上似水火难容,但结果却出现了双方学术的融合,并最终形成“汉学”。西汉是隶书普及的时代,也是由秦隶向汉隶转变的时代。当时问世的以《急就篇》为代表的一批字书,对文化传播

^① 关于秦博士学问题,东晋郭璞说:“秦博士典职教,礼仪所寄也。”不少研究者赞同此说。但事实是否如此,由于资料太少,学界还有争议。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汉世教育较周秦明显进步,中央设太学,地方立郡国学,还有培养史、卜、祝一类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另外,博士官与教育结合更为密切,太学教师例由经学博士充任,太学生亦称“博士弟子”。文史方面,汉初政论文、汉赋、乐府诗等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光辉,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史学史上的丰碑,且文史双馨,被后世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在艺术方面,汉墓壁画、茂陵石雕,展示了其绘画与雕塑的高超水平;杨家湾汉兵马俑、阳陵裸俑等表明,当时造型艺术更趋小巧,反映了社会进步与艺术成熟。西汉盛行楚乐楚舞,设有乐府专主音乐之事,产生了不少著名的乐舞人才。《七盘舞》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而百戏艺术亦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幻术表演、游乐竞技、杂技歌舞、木偶戏等。在科技领域,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等均有长足进步;时人创造发明的井渠法通过丝路传至西域,今新疆的“坎儿井”即运用此法修建的灌溉渠道。西汉时纸的发明创造,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四次发展高峰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其发展的巅峰。李唐一朝勃兴,正如陈寅恪所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5]从思想学术来看,唐代以经注疏义为代表的经学在继承汉学重章句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而中唐以来兴起的新儒学为宋学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显然,唐的思想学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隋唐长安地区为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尤其是宗派创立之举,对佛教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同时,长安也是道教的核心地区,还有其他宗教传播。书法发展到唐代臻于成熟,著名书法家层出不穷。因科举制的影响,唐之教育十分发达。京师长安设有六学二馆,地方则有州、县、乡学,另还有留学生教育。古典诗歌在唐代达到顶峰,长安则是唐诗创作最活跃、最集中的地区。唐时兴起的古文运动,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流弊,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飞跃,变文一类俗文学的盛行构成了唐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唐代史学亦相当发达。由国家设史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史书的制度,即始自唐。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中,唐时修撰的便有八部,习称“唐八史”。另如集体编

修的《唐六典》、个人撰著的《通典》等,也是唐世重要的史学成果。隋唐绘画艺术成就突出,画坛名家辈出。考古出土的唐墓壁画,取材广泛,富于生活气息,为我们具体展现了唐代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在科技方面,天文历法、医学、地理学及建筑技术等进步明显,成就斐然。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影响极其深远,对世界文化贡献巨大,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从五代开始,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长安文化没有再出现如同周、秦、汉、唐那样的发展高峰,而是在一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下继续发展。尽管其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文化亮点,发出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一类的豪壮声音,但总的来看,它昔日四次发展高峰期间那种文化主导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仅仅沦为西北地区的一种范围有限的区域性文化罢了。

三、长安文化的特点及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论的长安文化,尽管在某些时期,如前述的四个发展高峰期,足可以代表全国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醒目的符号,但从本质上来看,它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因受地域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皆显现出一定的个性特色。那么,关于长安文化的特点,具体有哪些呢?也许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一些不尽相同的结论。不过,以下的几点,应是其最基本的内容。

(一) 长安文化肇兴较早

早在100万年前,蓝田猿人便已经生活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地上。他们制造使用一些原始工具,采集果实和狩猎。史前长安文化由此拉开了帷幕。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基本上将长安—关中—陕西境内原始文化演进的足迹连接起来。从蓝田人到大荔人、黄龙人、金鼎人,再到以半坡、史家等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再到以浒西庄、下魏洛、客省庄、康家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组成了较为完整的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史前长安文化发展的序列。而这一发展序列,亦具有全国性意义。

如果从文明时代的历史来看,长安文明史的发端同样也是较早的。平时人们总说,中国有五千年

文明史。不过细究起来,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并非所有地区的文明史,都能写足五千年。然而在长安却不存在五千年文明史能否写足的问题,而是五千年这个时段是否够写的问题,是如何从众多的资料、丰富的内容中选优选精的问题。

一般认为,炎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迈入文明的门槛。当年司马迁写《史记》,以黄帝为开端,显然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大家知道,人们公认的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相传其部族就崛起于渭水中游和陕北高原。这就是说,长安—关中—陕西是中国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的黄帝陵,自西汉以来,历代供奉祭祀不绝,显然也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夏传子家天下”以后,长安—关中—陕西又长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心舞台。周、秦、汉、唐这样几个声威远播、最具影响力的王朝均建都于此,其所放射出的中华文化光辉,代表了当时人类所能企及的文明高峰,也谱写了长安文化的辉煌篇章。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连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融;同时也把长安—关中—陕西这片富饶的黄土地推向了世界,使之在人类文明交往的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见,长安文明史不惟起始较早,而且无比灿烂辉煌。

(二) 长安文化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

伴随人类自身产生而出现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受其制约,因此文化具有地域性。

长安文化的地域性,来自孕育它的黄土地。长安—关中—陕西古为雍、梁二州,战国时始称山西(亦称关中),即崤山和华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此地是古代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极有特色的地区。司马迁描述该地区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班固则描述道:“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3]。通过史家的以上描绘,不难体察出秦地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这些特定的条件,铸就了长安文化的地域特色。

不过,长安文化除了其地域性的一面之外,还有

其超地域性的另一面。这是因为长安在中国古代曾长期为国都所在地,特别是西周、秦、西汉、隋、唐这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朝代,皆以长安—关中—陕西为其统治中心,如此就决定了长安文化不像其他地域文化那样,仅仅局限于一隅之地,而是大大超出长安—关中—陕西的范围,涉及许多属于全国性的东西。

譬如讲长安文化之思想学术,就需要涉及《洪范》、《周易》、五德终始论、崇尚黄老、独尊儒术、经今古文之争、《五经正义》、新儒学等大家都极其熟悉并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容。

再如讲长安文化之教育,就需要涉及周之国学(小学、大学)、汉之太学郡国学、唐之中央六学、日本遣唐留学生等人们熟知并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教育文化的内容。

再如讲长安文化之文学、史学,就需要涉及《诗经》、汉赋、唐诗、《史记》一类为人们所公认的属于整个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内容。

总之,长安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大家族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成员;而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正是其特殊性的集中体现。

(三) 长安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居于引领地位

这一特点实际上与前述长安文化的超地域性直接相关。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先后有六个统一性王朝和六个分裂时期王朝在长安—关中—陕西建都,另外还有一个王朝在其末期一度迁都长安,一个王朝于其灭亡前夕暂都长安;如果再加上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关中一带建都的历史,那么,长安—关中—陕西建都史的时间便将近1500年。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国都总是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地,是统治的中心,一切政令、军令、法令皆出于此;国都所在地的一举一动,必然会成为全国的导向;国都这个中心区的文化,对全国来讲,天然地具有一种示范作用。长安—关中—陕西由于其漫长的建都历史,故而这里的文化便很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在全国居一种引领地位。

具体而言,长安文化的引领地位,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辐射性。这是讲长安以国都所在地的特殊身份,其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的问题——实际也就是讲国都文化的影响扩展、放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国都所在地总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各类重大文化活动包括科技新试验等总是发轫于此,境

内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差不多总是先出现于此。以汉代为例来看,譬如当时举办大型文艺宴会款待宾客的做法,便开端于京师长安;宴会上所表演的“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一类文艺杂技节目^[3],就是那个时代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还有自“西方来”者^[7]。再如汉武帝后期推行“代田”新耕作法,首先“教田太常、三辅”^[3],在京畿之地进行试验,然后普遍推广。由此可见,国都地区的文化总是处在整个国家文化的最前沿,是最发达的文化。历史上长安作为国都期间,长安文化因国都之重而成为以国都文化为主体的一种特殊文化。它对国都以外广大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并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它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向四周传播、扩散,不可抗拒。此即所谓的“辐射性”。这是长安文化引领地位的具体体现之一。

第二,荟萃性。国都之地又总是各类人才的荟萃之地。各色人等(主要是各式各样的优秀分子)满怀着希望与憧憬,采取各种办法,通过不同渠道,奔赴到国都所在地长安。他们或寻求仕进,或游说街衢,或兜售方术,或从事文学艺术。应该说,他们的活动皆为长安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那些出于制度原因而汇聚国都的人才。例如汉代察举制度下被察举出来赴京师对策的“贤良方正”等,唐代科举制度下赴京师参加“省试”的试子们。这可以说是一种批量人才荟萃。特别是科举制下赴京赶考的试子,一般在秋季启程赴京,省试则在次年暮春举行,试子停留京师的时间几近三个季度;且其人数众多,像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8]。如此多的学子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汇集京城,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盛举。何况唐代科举,于帖经、墨义、策问之外,另考诗赋,这样试子在复习经书同时,还需进行诗赋创作,以投献公卿,请求推荐。如此就相当有力地推进了当时京都地区文化的发展、繁荣。至于像西汉的董仲舒,其贤良对策一则“独尊儒术”的建议,便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面貌,当然就更是此类荟萃京师人才中出现的奇迹了。

荟萃于国都地区的,不惟有“人”,而且还有“物”。如汉代自“开玉门,通西域”之后,“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什么“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什么“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什么“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皆汇集京城长安^[3]。至唐代,随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汇集京城的“物”亦更加丰富。据美国学者谢弗研究,仅唐时舶来品的分

类目录,除“人”之外,尚有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17种之多^[9]。总之,国都乃人与物精华的聚集之地。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精华的聚集地,或者进而理解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精神财富部分)与物质文化(物质财富部分)精华的聚集地。正因为有这种聚集,所以国都文化才能成为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正因为有这样的聚集,国都文化才会向外传播、扩散。由此可见,国都文化的辐射性是以其荟萃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辐射性是外向的扩张的话,那么荟萃性则是内向的汇聚。二者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完整地体现了长安文化的引领地位。

(四) 长安文化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

长安文化以五代为界,明显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的长安文化,呈蓬勃发展之势,是名符其实的黄金期。特别是周、秦、汉、唐几代,长安文化不仅次第出现发展高峰,而且凸显出惊人的进取精神与开放气势。之所以如此,应该说是与这几个朝代本身所具有的进取开放特点直接相关联的。

众所周知,周、秦原本都是西部相对弱勢的部族,但却立志有所作为,经过不懈努力,前者灭商建立了周朝;后者则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周、秦的成功,除了自身积极进取的原因之外,还与他们以开放的胸怀广泛吸纳人才密切相关。譬如周文王重用姜尚,周公礼待天下贤士,“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2]等等。而秦人在这方面似乎更突出一些,他们大胆起用本宗族和本国以外的人才,以至论者认为秦“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10]。汉、唐时期的进取精神与开放气度,同样也令人叹赏不绝。例如汉张骞“凿空”^[2]西域^①,冯嫪自请出使乌孙,唐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日本等,皆当时积极进取、顽强追求的典型实例。再如汉唐与外部世界交往广泛,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甚至允许外国(族)人为官。汉武帝托孤重臣中就有匈奴人,唐太宗亦公然宣称对于“中华”、“夷狄”、“爱之如一”^[11]。还有唐代女性极为自由解放,导致最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武则天。当时还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准许外来

① 关于“凿空”的解释,《史记·大宛列传·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凿开通西域道。”《索隐》案:“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今人范文澜释为“探险”,似义更胜一筹。

宗教传播,文禁较少,以至诗人白居易写出了《长恨歌》一类直点皇帝的作品。凡此种种,足以显见那个时代的包容开放。由于长安—关中—陕西是周秦汉唐的崛起之地和统治中心,所以长安文化必然深受其进取开放精神的影响,因而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可是五代以后的长安文化,也就是后期长安文化,却明显发生了变化。昔日那种进取开放精神逐渐消失,而闭塞保守的特征日益突出。二者相比较,反差巨大。当然,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中心地位的失去无疑是最重要的。另外,自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陆上丝路为海上丝瓷之路所代替,以及长安—关中—陕西因长期处于统治中心区而遭受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严重破坏等等,应该都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关于后期长安文化的闭塞保守,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因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难以像周、秦、汉、唐时期那样汇聚大量优秀人才和最先进的精神、物质文化成果,从而各方面活力不在。二是相对单一的农耕经济和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上上”黄壤、“天府”、“陆海”)带来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我满足。三是“四塞为固”式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的缺少交流、视野狭窄、目光短浅。而这一切,在当时的婚姻文化上则有着最典型、最集中、最生动的反映。

关中民俗有所谓“八大怪”之说,亦称“秦风八怪”^①,其中一怪曰“姑娘不对外”。它的含义通常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女儿不能嫁往外地,二是女儿不能嫁给外人。所谓外地,即指外省、外县,甚至包括离家门几十里开外的任何地方;所谓外人,即指外省人、外县人,亦包括居住于本村、本地的客家户。”^[12]这种婚姻观念与文化表明,关中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婚姻关系上把自己的后代束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生活圈子而不能自拔,形成了一个封闭排外的社会文化系统”^[12]。如此的婚姻文化,恰恰正是宋元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通过这“一斑”,不难窥知“全豹”矣。

(五) 长安文化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

自古以来,长安—关中—陕西就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汇交融的地区。具体来看,这种文化交汇交融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这里的“内”、“外”区分,皆以今日中国疆域为准,前者指境内在历史上所发生的因部族、民族融合而带来的各民族文化交汇交融,以及华夏族(汉族)统治下地区间的文化交汇交

融;后者则指与境外国家之间,即国际间的文化交汇交融。

中国历史上,各部族、民族不断融合是其发展的主流。崛起于关中的周人,先祖曾“在戎狄之间”^[2],并最终灭商,这当中显然含有周与戎狄、周与商两族的融合以及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汇交融。秦人源于东而兴于西,先天便具有东夷文化与西部文化汇融的特色^[13]^②。立国后,其更是全面接受周文化,并不断征服、融合陕、甘境内诸多戎狄,同时广泛吸纳六国文化,至始皇统一则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秦帝国。其间部族、民族的融合以及他们文化的交汇交融,自不待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民族文化交汇交融,更是规模空前,而长安—关中—陕西恰好就是这场大汇融的一个中心舞台。此后,在长安建都的隋、唐两代——特别是唐帝国,应该说正是此前民族融合及各民族文化汇融结出的丰硕之果。再后辽、夏、金、元、清时期的长安,虽然已经无法与以前居政治中心地位的长安相提并论,但民族融合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民族文化交汇交融却依然存在,只是这些仅仅具有地方性意义罢了。

关于地区间文化交汇交融,秦汉时期的事例,尤其堪称典型。秦汉帝国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量,多次大量迁徙关东豪富等充实关中,从而造成关东、关中地区的文化交汇交融。古代史家曾用“四方辐凑,并至而会”^[2]的文句对这种交汇交融做动态的描绘,指出其结果是使以关中为主体的陕西大地“五方杂错,风俗不纯”^[3]。日后长安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前述因部族、民族融合而造成的文化交汇交融,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视为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汇交融,但它显然应该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地区间文化汇融,与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华夏(汉)族治下地区间文化交汇交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有关国际间的文化交汇交融,最具代表性者,自然要数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这一实例了。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后,即被一步步加以中国化的改造,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中外文化交汇交融。最初

^① “八大怪”说法有不同版本,较通常的提法为:面条像裤带,烙饼赛锅盖,辣子一味菜,碗盆分不开,房子一边盖,姑娘不对外,帕帕头上戴,唱戏吼起来。

^② 关于秦人“源于东”问题,据李学勤新近揭示,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亦有所涉及。见氏著《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刊于《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第11版《史学》。

佛教被称作“黄老、浮屠之祠”^[14],诚如吕思勉所言:“佛教流传,依附黄老”^[15]。如此一种“依附”,实际就是被中国化的表现。继而佛教在源头上又被中国化:或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14],或说“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16]等等,不一而足。这样一来,原本属于舶来品的佛教,乍看之下反倒成了地道的中国土产宗教;佛教的创立者不是“夷狄”释迦牟尼,反而是“中土”的老子了。及至唐代,佛教中国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佛教宗派的创立——这类佛教宗派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化佛教的派别。当时创建的佛教宗派极多,但在影响最大的八个派别中,十之七八是创立于长安的,如法相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等。可见,唐代的长安为佛教中国化的一大中心。需要指出的是,唐时京畿地区不惟存在佛教,而且还传入有摩尼教(明教)、祆教(拜火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支派)等外来宗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汇交融。故而以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一带,实际上成了中外文化汇融的圣地。当然,国际间的文化交汇交融并不只限于宗教一项,其他如国外派来的遣唐使、留学生等,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总之,长安—关中—陕西历史上的“内”、“外”两方面多种文化的交汇交融,乃常态的客观存在。惟其如此,才造就了周、秦、汉、唐四大文化发展高峰期长达千余年长安文化那种博大包容、恢弘深邃的气势和积极向上、开放进取的风貌。这既是长安文化的亮点,也是其显著特点。

以上所述,仅仅只是粗线条勾勒的长安文化特点之大要,希望以此为广大读者了解长安文化提供一点参考。至于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下的两点尤其值得重视。

1. 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中华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过,中华民族是比较晚才出现的称谓,其前身为华夏族。这是史前散居各地的众多氏族、部族、部落联盟,通过长期交往交流,包括联姻、结盟、战争等等,逐步融合起来而形成的。徐旭生曾指出,华夏为古代部族三大集团之一,是炎帝和黄帝所代表的西北部族^[17]。炎、黄皆起自以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境内,他们的活动自然是首先谱写为长安文化的篇章,继而扩展出来更广泛的意义。从这种角度考察,长安文化显然具有一种源头的性质。

当然,炎黄之前还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化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人们将其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迄今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点多达数百个,遍布全国29省、市、自治区,不过其中距今超过或接近百万年者却十分有限。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是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原始文化,距今180年以上。云南元谋上那蚌猿人牙齿化石,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70万年。除了这两个“最早”之外,距今百万年左右的原始文化遗存还有两处:一是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距今约100万年;再就是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遗址,距今约115万年(另一测定数据为98万年)。前文曾指出,长安—关中—陕西境内,自蓝田猿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已经组成相当完整的发展序列,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并与传说的炎帝黄帝相衔接。由此来看,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2. 长安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彪炳寰宇,震古烁今。但是就其发展而言,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史前和先秦时期,它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多元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格局,应该说就是这一特征与诸多其他因素相作用的产物。尔后,以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为开端,经过长期的演进,才逐步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而这一切显然与长安—关中—陕西这块地方,与长安文化息息相关。

据前述可以知道,自“家天下”之后,西周、秦(秦国秦朝)、西汉以及隋、唐几代,相继四次把长安文化发展推至高峰。而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恰好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时期。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周秦汉唐几代均以关中地区为其崛起基地和统治中心,如此长安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交叉、重合,乃至出现一种特有的同生同长、同步发展现象。尤其是秦汉时期,既是汉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生成的关键时期,显得更加特殊而重要。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时的长安文化与整个秦汉文化、中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在诸多根本性方面,是交织在一起、混同在一块的。换言之,即是说构成中华文化最根本性的内容,如集权式政治制度、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态、小农经济体制、“霸王道杂之”治国理念、民族融合、文化汇融、丝路交流以至绵延不断的以纪传体为主的历史记录等等,或发端自长安,或奠

立于长安,或完善于长安。要之,亦即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大多是在长安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惟其如此,所以长安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而且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奠基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长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地位重要而特殊;它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阮 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班 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鲁 迅. 鲁迅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三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张 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7]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杜 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0] 洪 迈. 容斋随笔[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 黄留珠. 中国地域文化·秦文化卷[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
 [13] 黄留珠. 秦文化二源说[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5(3):28-34.
 [14] 范 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 陈 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 徐旭生. 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M]. 增订本.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Discussion for Chang'an culture

HUANG Liu-zhu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Chang'an culture is recognized as Shaanxi culture, with Guanzhong area as its main body. The pre-history Chang'an culture can be dated back to the original culture of Lantian ape men a million years ago. In the civilized time, Chang'an culture experienced West Zhou dynasty, Qin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Qin dynasty, West Han dynasty and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ith its mainly 4 brilliant periods. Chang'an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earlier start, co-existence within and outside its regions long-term leading position,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arlier period and later period, and multi-culture blending. Chang'an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Chang'an culture; development peak; development course